

## 逐譯、越界與文本多義性：

### 以林紓翻譯的《魯濱孫飄流記》為例

紀元文

文學作品的翻譯作為溝通不同文化間的橋樑，涉及文字的轉換與文本涵義的詮釋。什麼是衡量好的譯作之標準？在〈譯天演論例言〉(1898)一文中，嚴復首先提出「信達雅」的翻譯宗旨：「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僭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嚴幾道 1991:3)。考察嚴氏的譯作實踐，乃屬融會文義與章句的意譯。在晚清戊戌變法之後，競倡西學以力圖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思潮中，此一偶然的歷史機緣所形成的文化翻譯概念，竟然在中國面臨西學衝擊之際，在翻譯界引起諸多討論。不管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甚或在今日，贊成與質詰此一理念之論述自是史不絕書。甚而餘緒盪漾，流風所及，至今人們談起翻譯，此一譯學先驅懸為奮力追求之鵠的，至今仍是聚訟紛紜。<sup>1</sup>然則由於文學作品係透過「語言的踐行式力量」(“the performative powers of language”)以再現、摹繪、與建構作家所感知之內外在現實，並透過各種文學生產的機制與網路，散佈、傳播文本於讀者之間，試圖表達作家的關懷與見解，連結社會與個人之關係，進而對於整體的社會文化進程有所影響(Miller 9；單德興 1995:6)。換言之，語言文字

仲介、承載現實，在某一個意義上而言，文本的效力及於特定的對象與時空，否則何來「力量」之有？後結構主義以降的批評家質疑語言的表意功能，重新檢證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之間的聯繫，視現實純為語言之建構而已，其意義是不確定的，閱聽者只能考掘文本延異與衍生的軌跡。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家更徹底顛覆語言與現實之間的關聯，認為一切文字上的努力與經營均為無盡的戲耍與耗竭而已，此屬於知識論認知外在現實以及語言如何再現(represent)現實之間的辯證範疇，本文不擬列論。在此僅就翻譯者運用語言在文化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加以論述，並就林紓(1852-1924)以文言文翻譯西洋文學作品於清末中西文化交鋒的脈絡中所代表的意義。徵諸林譯之《魯濱孫飄流記》，在遙譯的過程中試圖以代表傳統文化表徵之文言文馴化外來的他者，以適應中國社會文化之現實。再者由於文學作品本身乃是建立在語言的仲介、再現功能，因此其意涵歧出多義，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欲將此一內容遊移不定的文本固定化(fixated)於某一特定的時空脈絡中，其闕失誤謬在所難免。吾人以文化研究的觀點檢證翻譯作品在不同時空旅行、越界，宏觀地闡明文學翻譯、文學發展史與文化變遷等議題之間錯綜複雜、纏綿纏結之關係，最後歸結林譯西洋文學作品實有助於晚清以來小說地位之確立。

一、

由於翻譯者係以語言媒介，介紹不同文化間之交流匯通，其為仲介的角色是明確的。在〈翻譯家的職責〉(“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23])一文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翻譯是兩種語言「隱藏的意義之再現」(1969:72)，究竟要闡發文化中之幽微隱逸的精意深旨，非透過語言的仲介無以畢其功。設使言

語道斷，參透禪機偈語的一途徑，捨頓悟、直指本心無由，是則非常人所能為。譯者所扮演的角色須忠實於原文的內容與形式，不得竄改、增刪原作，當然亦非據用或徵用 (appropriate or expropriate) 原作以為另行創作之資。因此，身居作者/閱聽者、原作/譯作之間，譯者的可靠性不在於扮演抄錄者、模仿者或原作者的角色，而是在於成功地達成「仲介的溝通」(“mediated communication”)之效能 (Neubert 1989:11-12)。林紓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與曾宗鞏合譯的《魯濱孫飄流記》(The Life &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的序言中也清楚地指出：「譯書非著書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書吾所見。乘虛逐微。靡所不可。若譯書則述其已成之事跡。焉能參以己見」(林紓 1973: 2)。此一認識實有助於吾人釐清翻譯者之功能，並據此作為訓練與養成譯者之主臬。事實上，人類知識之建立與積累乃是透過仲介翻譯之助，口頭與書面資料源源不絕地相互穿越、滲透，越過語言的藩籬，使得不同的文化間能夠互相滋養、灌溉，去舊佈新，加入新的源頭活水，創造更輝煌的燦爛的文明。紐伯特 (Albrecht Neubert) 特以持火炬者的隱喻形容譯者仲介的功能：

雖然譯者本身，特別是他的名字，很少成為眾所矚目的中心，其仲介活動經常被提起，而其行動卻甚為謙抑，不過卻依然決定性地在背景中進行。仲介者是僕人。他們舉起火炬，因沒有他們[譯者]而處在暗處的兩方，才得以溝通，但是他們本身依舊留在暗處，他們的性格要求他們樂在其中 (Neubert 1989:12)。<sup>2</sup>

由於林紓本人不諳外文，譯作乃是透過舌人之口述，再由林紓以桐城派古文筆之於書。對於其譯文精確信實與否之疵議所在

多有，林紓亦坦承不諳西文之事實：「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廁身於譯界者，恃二三君子，為余口述其詞」（1961e:5）。此種雙重的逐譯轉接，頗似柏拉圖對於模擬三重失真的譬喻：藝術家描摹工匠製作的實物，而工匠模擬本體的純粹概念製成器物，其間扭曲舛誤尤屬難免。因此林譯中的誤謬也類似此種情形，因而顯得撲朔迷離，而難以追究到底是口述者之疏漏，還是筆譯者之誤解。<sup>3</sup>與林紓同時代卻採取不同的語言與敘述策略的李伯元，在《文明小史》（光緒三十二年，1906）一書中，針對晚清維新人物光怪陸離的行徑有十分辛辣的譏評。<sup>4</sup>林紓本人囿於對西方文學不熟稔，對於文本的選擇似無置喙餘地，因此難免取決於舌人之文學品味。故此在其龐雜的譯作中，今日的讀者看來，不免有和光混俗之慨，當然其間亦涉及文本的選擇與經典化的難題。然則就作為通俗文學之文本，這些譯作在清末民初救亡圖存，競相學習西學的時代脈絡中，固有其相關性。林紓大率於這一百來部的譯序、跋、或達旨中縷敘翻譯過程，陳述個人的文學觀感，並抒發一己感時憂國之思，因此這些論述提供吾人蠡測其思路轉折之軌跡。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他警惕亡國亡種之危機，感嘆老驥伏櫪，報國無門，只得譯書激勵年青人，力陳振興實業的重要，並對文學載道寓意的社會功能，傳統道德的陵夷等關目，多所著墨（林紓 1961a: 24）。這些議論從西洋文學的角度，與中國的現實情境互相對話，頗能一窺當時的時代思潮：

至少他是第一次用西方文學作為參照系，對於中國傳統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審視和反思，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開闢鴻蒙的作用。他的序跋，信筆揮灑，融貫東西，精驚八極，神遊萬仞，頗有一些「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的妙悟（林薇 1997:373）。

再者，就《魯濱孫飄流記》一書而言，此一作品乃是狄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於十八世紀初葉，以實證論(realism)的觀點，採取新的敘述策略(有別於英雄史詩、傳奇等傳統文類)，以摹繪日愈崛興的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經驗為主。在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背景中，個人主義思潮的崛起不止在哲學與宗教上造成世俗化、人本中心的變革，在經濟生活，社會階層與政治體制的運作上亦迥異於前代。面對這種空前的遽變，文學體製的興革乃應運而生，散文小說的興起與此歷史發展頗有密切的關連。誠如研究十八世紀英國小說興起的瓦特(Ian Watt)所言，《魯濱孫飄流記》中簿記式、翔實的庶民日常生活記載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它是第一本小說敘述，在書中普通人的日常活動是其連續不斷的文學關注之中心。……小說的前提是，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與趣味性足以當做適當的文學題材，清教徒勞動神聖的概念，可能有助於此一主張之誕生」(Watt 1957:82)。狄福的小說大率描寫此一時期中下層社會變動的情形。因此對於外在環境的場景、氛圍，以及書中人物的容貌、聲歎、對話，乃至於心理活動，只要有助於形塑主人翁的個性、或與整體敘述結構攸關的種種瑣碎細節，皆不憚其煩，翔實縷述，是為小說文類的雛形。諾威克(Maximillian Novak)在提到狄福這種無所不包的寫實策略時，特別指出其歷史意涵——狄福出身長老會之教育背景，使得他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宗教勸懲意味，因此與其說他是一位紀錄社會現象之歷史學家，倒不如稱他是宣傳家或是新聞記者。他屢屢在其作品中倡導、禁制特定的社會議題，並猛烈地抨擊、嘲諷、針砭時政，甚而惹禍上身。其文本裡的寫實成分強調角色、事物皆稽而有徵，乃是在造成書中之描繪皆為事實之印象。這些形似真實事件的敘述在早期散文小說的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狄福特別稱其作品為歷史、回憶錄，與英雄、騎士之傳奇故事有所區別：「狄福不是那種

會在敘述中刪除其觀點的人。他傾向於以惠格歷史家(Whig historian)的態度研究歷史，以自由之進步做為神恩彰顯於世之證據，以古喻今」(Novak1983:53 又參閱 Novak1964:655-67)。嗣後從討論此部小說之內容與形式所衍生之論述，開啟各類散文小說之嘗試，並具體而微地呈現十八世紀英國文壇繽紛多彩的景象，故其於小說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狄福年近六旬才從事散文小說之寫作，一般人以為他是迫於債務才率而操觚，鬻文為生，其實如果我們考察其散文敘述，如何有別於當時流行的傳奇、英雄史詩等文類，就可以曉得他是有意識地從事一種新的文體之實驗。此一時期也正是費爾汀(Henry Fielding)、理察遜(Samuel Richardson)等作家抒發各自對於散文小說體製之觀點並著手從事實驗之作。質言之，就狄福主要的五部小說而論——《魯濱孫飄流記》、《辛格頓船長》(Captain Singleton, 1720)、《女賊史》(Moll Flanders, 1722)、《傑克上校》(Colonel Jack, 1722)、《羅克珍娜》(Roxana, 1724)，他創造了一些中下階層的主人翁，讓我們看到底層社會庶民生活在時代變遷當中所呈現的不安、騷動與欲望。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並增加可信度，他在《魯濱孫飄流記》序言中聲稱：「編者相信書中的事情僅祇是歷史事實，其中並無任何虛構之巧飾」(Defoe 1985: 25)。這些寫實的情節之目的乃是娛悅與教誨的功效，符合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一貫的文學主張。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以第一人稱的語氣敘述主人翁的靈修自傳、冒險紀遊、個人經濟烏托邦以及宗教與政治預言等，要之，皆歸於寫實主義的大纛之下，不無「江海之納百川」之勢。此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出散文小說起源的階段匯集多種文學體製的事實，驗證文本中的眾聲喧嘩；另一方面亦洩漏作家有意識地剪裁、編輯文本之斧鑿痕跡：「[這些小說]的產生乃是出於狄福有意識地運用想像力，為創作散文敘述的緣故而

作，其力量直接來自於再現經歷活潑而真實的世界之人物」(Novak 1996: 67;)。<sup>5</sup>

## 二、

衡諸林譯，值得商榷的地方大抵在於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是否契合市井蠅營狗苟，錙銖必計的庶民生活經驗？當時代白話語文與古文之爭，洵為此一議題背後波濤洶湧之癥結。尤有進者，林譯言簡意賅的文言遙譯，透過句型重組與節刪，是否有買櫝還珠之憾？毋庸諱言，多數談論林譯的成就，均眾口同聲地稱讚他提升小說之道在晚清中國社會之地位，並啟發青年學子對於文學之興趣，使得小說的種籽在五四運動之後開花結果。魯迅、郭沫若、錢鍾書等作家都承認青少年時期頗為喜愛閱讀林譯並從中得到不少閱讀的樂趣。(鄭振鐸 1981:16-17; 阿英 1960:1)。薛卓在評價林譯的成就說：「它對衝擊中國三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促進了小說體裁的解放，為人們開拓了世界眼光，給清末文壇注入了新鮮血液，客觀上合乎民主革命的需要」(1983:396)。這段評語清楚地指出林譯之成就，但是這些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是林紓本人始料所未及的。思想上的解放帶來「民主革命」的思潮，這與林紓終身一貫的保皇思想是互相矛盾的。至於小說形式、體裁的解放，林紓本人囿於其出身背景與捍衛古典文學之立場，無法體認社會語言動態遞嬗演變之勢，執守士人階層之文言文：「其語言文字為此族人所不行者，則其書不傳」(嚴復 1960:10)。在語言方面林紓與嚴復站在同一立場，他們所指的通行語言當然就是彼時知識階層作文所用的古文。與嚴復同時代的一位批評家稍晚談到小說語言的問題，則表達相反的見解：「古文之不如今文，亦以其普及之性質，一有限一無限而已」(楚卿 1960:29; 又參閱魯迅

1973:366-67；胡適 1986a: 140-46)。就小說文類的引介而言，梁啟超與嚴復等人有鑒於中國民智未開，特以歐西、日本諸國發展的情形，乃積極撰文鼓吹引介西洋小說，並猛烈抨擊傳統說部，認為其題材內容「不出誨盜誨淫兩端」(梁啟超 1989a:34)。推究中國腐敗、落後之根源，乃是舊小說中大量充斥「狀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盜賊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等，駸駸乎深入人心，荼毒國家社會，於是乃以譯介西洋小說以為救治之道(梁啟超 1989b:9)。<sup>6</sup>梁氏為文「筆鋒常帶感情」，頗具渲染力，其對於小說之論述，最膾炙人口的一段乃載於〈譯印政治小說序〉(光緒二十四年，1898)：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鬻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僧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而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1989a:34-35)。

至於歐西與東瀛諸國之富強，是否皆由於小說之道倡行之緣故，頗有值得商榷之處。誠如夏志清於《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一文中討論綦詳：「英法二國到底何時開化？文藝復興時？啟蒙運動時？還是產業革命時？因為這兩個國家雖然在這些時期都有特殊的小說文學（包括戲劇）作品，我們卻很難說作者有意配合時代精神和政府的龐大平民教育計畫，以教化群眾」(1977:70)。基本上，他們都是從工具化理性的態度出發，主張譯介西書以縮短中國社會落後西方之弊，而小說通俗易於傳誦，具



有情感的渲染能力，更是啟蒙的利器，因此其論述具有強烈的的淑世功能。如前所述，文學作品之效應(如果真的有社會功能的話)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能夠以精密的統計數字來證明，這與文字再現現實之窘困以及文本涵義的不確定性皆有所關連。因此，當梁啟超等人以小說作為歐西社會進步之樞紐，容或有高估小說之力量，須知西洋社會之現代化進程有其深邃的思想背景在焉，小說的發展只是其一端而已；它是啟蒙運動後的理性思潮中，西洋社會歷經哲學、宗教、政治與產業經濟生活急遽變革後的產物。沒有深入探溯西洋變革的意義，並檢討中國社會結構中是否具有這些思想的因素，只是橫向移植西洋小說做為解決積弱的萬靈丹，此一作法似乎是忽略歷史演變的複雜性。企圖以過度簡化的化約論達到齊一、便捷的結論，如此只是治絲愈棼，而不見小說形式發展的意義。過度貶抑或揄揚小說都是不適當的，如果不是揠苗助長就是懸為禁厲，如何能令其成長、茁壯？同樣地，過度強調小說工具化的濟世層面，而忽略了美學層面的考量終究是有礙新興的小說文類之發展。晚清迄民初的文學革命運動暨其後左右派的論戰賦予小說太沈重的社會使命，洵至於褊狹的寫實主義當道，使得原本應當眾聲喧嘩的文學殿堂，驟然萎縮成為一言堂，這不能不說是小說文類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

梁啟超、嚴復與林紓都有不少文字談論小說之功能，獨獨不及於美學形式，這種現象亦表明彼等在時間與歷史的壓力之下，面對新文類所展現的焦慮與惶惑。這是晚清以來飽受國恥之辱的知識分子在思考中國現代富強之道常常陷入之迷思，尤有甚者，此一思維方式偏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同時亦斲喪、杜絕其他文學形式之實驗：「這種感時憂國精神繼而又把主要目光集中到文學的內容而不是形式，集中到得天獨厚的『寫實主義』」(李歐梵 1996: 229)。文學題材的社會教化功能一直是批評家爭論焦點，但是文

學作品本身卻是十分排拒強調其社會與政治效應的。就作家創作的角度而言，美學形式的設計應勝於其他的考量。因此，如果閱讀文學作品有任何的效應的話，那應是作品裡所再現的情節與現實的人生依稀保持若即若離的平行關係，可做為讀者參證之函數。透過閱讀經驗，讀者可能會「在道德上消除歧見以適應社會規範」(“morally ironed out to conformity with the civic norm”)，而非立即而明顯地造成整個社會的轉變。文學既無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其主要功能亦不在此(Doody 1996:283; Goldmann 1974:93-94)。如果說梁、嚴提供小說發展的理論基礎，那麼林譯西洋文學則是文本實踐的例證。當然在實際作為上林譯刪節文本，割裂/扼殺小說的整體的形式結構亦為眾批評家訾議之處。反諷的是蟠溪子(楊紫驎)曾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翻譯後半部的《迦茵小傳》，讀者皆以未能窺其全豹為憾，尤其是女主角犧牲自己，成全男友之義舉更是賺人熱淚。及至林紓與魏易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在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全集中找到該書並全文譯出，讀者方知女主角乃未婚懷孕，因而破壞了迦茵在一般讀者心目中美好的形象。蟠溪子有意為故事中的女主角隱而保持其令譽，林譯的忠實的全譯本破壞女主角美好的形象，反而招致讀者的抨擊(林紓 1961b:40)。

同一文本在不同譯者的操控之下，以迥異的面貌刊行，在讀者之間產生南轅北轍的文本踐行效果，從而引發緊張對立的張力，這從翻譯文本接納史的觀點而言饒富興味。文本的意涵除了內容、題材之外，敘述策略、語言文字的選用(典雅、俚俗)、鑄造新詞以中介新觀念等等，這些鑲嵌於文本背後或隱或顯的各種意涵，皆為中介的譯者所不能忽略的。當然提出文本多義性的議題並無厚誣前賢之意，只是以此作為從事譯事者之借鑒。從文化逐譯與越界的觀點而論，保留原作的形式、語法、句型，容或有

笨拙、詰屈聱牙之累，但可以忠實保留原文，並且將陌生的「他者」融入目標語言的脈絡中，這未嘗不是產生新的文化之動力。魯迅曾以唐朝佛經與元代上諭的引介，說明語法的變遷，並因而豐富了中土的文化內涵：「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語氣，但因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來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魯迅 1973:209）。梁啟超在研究佛經的翻譯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亦持同樣之觀點（參見〈翻譯文學與佛典〉收錄於《飲冰室專集》之五十九）。

質言之，林譯以典雅豐贍的文言語彙與句法翻譯西洋文學作品，在時勢、風潮遽變的年代，欲肩負雙重的任務——啟蒙新知與捍衛舊學——然則文本的轉換與移置於跨越文化的疆界後，顯然與固有之文體與語言有扞格與齟齬之處，如何呈現形式本身遞嬗演進之意涵，更為討論小說文類須再三留意者。林紓以古文翻譯西洋小說並親自從事小說創作（長短篇具備），雖然引介了新的題材與元素（西洋的風俗、習慣與自由戀愛等風氣），然而在小說形式與語言的實驗上成效有限。新文學運動的健將胡適縱然對林紓用古文書寫不無微詞，還是等定他的努力：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作翻譯小說的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股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1986a: 86）。

然而由於其採用的語言策略未能與時俱進，最後淪為僵硬、固執

的保守立場，在五四時期堅決反對白話文與新文學，一度成為提倡文學改革者嘲諷、攻擊之對象。嚴格而論，林紓之古文亦非純粹之桐城派章法，而是師法左傳、莊子、司馬遷、班固等史家之精神與筆法，在桐城派文論的基礎上，別出機杼，在描摹曲繪日常生活細節與鄙瑣污穢的下層社會現實裡，替垂死的文言文找到一個新的論述空間。然而無由接觸散文小說興起之歷史背景因素，「林紓的文學活動是以古文為杼軸的。他已受過古文哺育的思想，再用古文論、尤其是古文義法去論小說，一則很受舊觀念的束縛，二則對小說的特性注意不夠，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處」（曾憲輝 1990:12, 又參閱 13-14, 20-22; Lee 1965: 161-62）。而其引介的新知更加速傳統的傾圮解體，處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之下，林紓立場之窘困尷尬與心情之鬱悒孤憤，可想而知。

林紓翻譯之種類既多，品質雜駁不一，大抵是前期優於後期，可能的原因是早期他抱持相當的熱忱從事筆譯之工作，加上他本身亦具有相當的文學素養與敏感性，所謂「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林紓 1961e: 5），因此譯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殆至後期，年老體衰，猶從事翻譯以為稻糧謀，難免就力不從心了。如前所述，口譯者的文學修養與品味，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林紓秉性耿介不願意仰仗科舉功名求取不當的利益，雖年近耄耋，猶以作畫與譯書為生。在〈《旅行述異》序〉中，林紓自敘：「然自食其力，或為當世君子所憐，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林紓 1961d: 53）。在前清與民國初年，他曾多次婉拒保薦出任官職。關於這一點，雖然當代許多人對於其捍衛傳統文化的頑固保守立場有所揶揄，然而他廉潔自持的操守卻是始終一致的（阿英 1981:2-3; 錢鍾書 1990:97,116, 37n）。

三、

翻譯的中介溝通特質牽涉到文本在不同文化間的移置、旅行、與越界，因而產生模式轉換的問題。翻譯之前首要解決的前提，當然是譯者是否適當的問題，這是能力的範圍。其次，文化模式相容與否的問題 (Benjamin 1969: 70)。從此一觀點出發，林譯可商榷之處的確不少：林紓本身不審西文，仰仗口譯者之助而從事筆譯，文本的選擇與文學品味皆受制於口述者，因而評者屢屢貶抑其大部分譯作文學價值不高。再者，狄福質而不文、深具現代寫實傳統的意涵的散文體小說 (prose fiction)，以詰屈聱牙的古文翻譯是否適當？尤有甚者，在改寫/翻譯的過程當中，節刪、竄改、倒置等等割裂文本體裁之例不勝枚舉。我們要以何種的批評觀點看待如此的譯作？阿薩德 (Talal Asad) 以功能主義派人類學在田野調查中介紹異文化的「思想模式」 (modes of thought) 論述陳明，引介異文化需進入該社會思想脈絡中，以瞭解該社會制度運作的方式，如此才可能避免一廂情願式的臆測與錯誤 (Asad 1993: 172)。在此立論基礎上，他接著提出文化翻譯的概念，並提出好的翻譯的一些判準：

所有好的翻譯尋求在翻譯者自己的語言內複製外來論述之結構。那個結構 (或「連貫性」) 如何被複製乃是依靠相關的文類 (詩、科學分析、敘述等等) 與翻譯者的語言之資源，以及翻譯者與/或其讀者的興趣。所有成功的翻譯皆假設它是被導引於特定的語言之內，因此亦導向某一套特定的習慣，某一種特定的生活形式。離開原作愈遠的生活形式，其複製品就愈不那麼機械性 (Asad 1993: 189)。

翻譯的功能既然在於仲介外來文本及其整體的文化意涵，那麼應該如何面對異質的「他者」呢？使之能夠融入「目標語言」(the target language) 的語彙中，形成該文化的表意結構的元素呢？抑或保留未馴化的他者以作為新文化因子之契機？啟蒙運動以降的理性思潮，重新界定人與神、外在世界的關係。人作為思維實體(res cogitans)透過思考確立個人主體的存在，外在的空間乃是展延實體(res extensa)，是物質世界的場域。心、物分裂的結果是，人與神、萬物和諧的關係不復存在。根據黑格爾的哲學觀念推演而來的「他者」(the Other)之概念，係指「對主導性主體而言不熟悉與外來之事物，主體的權威係因相反或否定的因素之存在而得以界定」(Boehmer1995:21)。就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溝通而言，翻譯的動作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地不對等權力關係存在。質言之，這種語言權力的不對等關係(inequality of the power of languages)肇因於現代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侵略與擴張行動，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社會之語言之間存在著不對稱的趨勢與壓力。這種形勢構成全球權力分配的模式。徵諸百年來帝國主義者挾著船堅砲利的科技優勢，陵夷亞非洲殖民地，接納/排拒西學莫不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永恆的渴望與難題。時至今日，在全球化的召喚之下，跨國企業所操控的文化工業正迅速地建構全球單一、同步化的消費品味(好萊塢電影、音樂、影音錄影帶以及更進步的電腦軟體與光碟產品等)。面對此一險峻的形勢，第三世界的國家徘徊、踟躕於現代化的追求與在地特色的堅持之間。欲拒還迎，欲迎還拒，差可道出其面對於西學的窘境(Asad 1993:99，又參見 194-95；劉人鵬 1998：25-26)。

在「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史碧薇克(Gayatri Spivak)更清楚地指陳，種族、性別與國家的權力結構施加於弱勢族裔的箝制、壓迫與消音。此種宰制關係不僅止

於實質的暴力，在細微的語言、文化層面上亦屢見不鮮。因此，當一個文化盱衡內外情勢而不得不皆受「他者」的入侵時，其本身就是一連串抗拒、調適、妥協與協商的結果。這也是一種調和語言的外來性質的權宜方法(Spivak 1993: 194-96; Benjamin 1969: 75)。阿薩德從社會人類學的觀點考察文化翻譯的見解容或可以做為譯者伸介外國文本之借鏡：「我的論證是指向反對翻譯需要調整『外來』論述以適應新場域。依我之見，在接納的語言內應保留令人不安——甚至惹人反感——的實存(a discomfoting—even scandalous—presence)」(Asad 1993:199)。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後，梁啟超、嚴復等人的譯介西學，甚至於梁啟超所再三推崇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傾國大力提倡西學，皆可做如是觀(阿英 1966:180-81; 復旦大學中文系 1960: 242-44)。在林譯西洋文學作品裡，其所設定的讀者群乃係知識階層，故譯者採用文言文來譯介西方的小說文類，知識階層易於接納其文本，譯者啟蒙的目的才能達成。<sup>7</sup>然則由於當時的中國教育不普及，一般的民眾對於詰屈聱牙，深旨奧義的文言文的接納程度，反而不如明白曉暢的百話文來得容易。這大率由於林紓本人保守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一方面他要維護傳統文化書寫機制以及鑲嵌在此一機制背後的政治、道德與傳統社會之規範，另一方面，林紓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與強烈愛國心又驅使他以耄耋之齡，孜孜矻矻奮力於譯介西學，啟迪青年學生之知識，再三致意於「振興實業」作為愛國保種之鵠的(林紓 1961a: 24; Lee 1965: 171-72)。

在這種情況之下，翻譯所呈現的工具化理性意涵可謂不言而喻，這自是晚清現代化進程中相當引人注目的一大關目。<sup>8</sup>而林紓的翻譯實踐，其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妥協與與協商的斧鑿痕跡，斑斑可考，這也是在當時的時空之下萬不得以的權宜措施。班雅民

以器皿之零碎片斷重新拼整之隱喻說明原文與譯文之間的意義系統連結之關係：「即將被黏合在一起的器皿之殘片在最微末的細節上必須彼此契合，雖然它們不需要彼此相同。同樣地，不需重組原文的意義，翻譯必須忠實而詳盡地融入原文意義的模式，使得原文與譯文可資辨識為較大的語言之片斷，如同片斷是器皿的部分一般」(Benjamin 1969: 78)。經過譯者中介、逐譯而越界的文本，是否契合原文的意義模式厥為文化翻譯的重要課題。在林譯《魯濱孫飄流記》中可資討論者，計有敘述形式的變換與譯者主觀意識投射於節刪、竄改的文本。<sup>9</sup>

研究狄福的學者咸認為《魯濱孫飄流記》具備散文小說的雛形，不管是其翔實的日常生活細節描繪（種麥、燒陶、製作麵包，繁殖山羊、伐木造筏等等），抑或敘述策略的運用（擺盪於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敘述者之間，其間亦有歧出為日誌形式）。在小說的開頭，克魯索係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作身世自敘：「魯濱孫曰。余生於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約克城中。一積善之家。余雖非土著。然吾父以布利門人。久客於此。遂成寓公」（林紓 1973: 1）。此一敘述策略之目的乃在於極力建構/再現外在世界的現實，讓讀者以為其所閱讀的文本乃是事證確鑿，有稽可考的海上冒險歷程。除此之外，其文體尚包括日記、清教徒自省日課、德行優劣表、財產損益表與器物、莊稼、食物、環境等翔實的簿記式紀錄。在《魯濱孫飄流續記》(1906) (*The Farther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中，狄福亦自覺第一人稱敘述過於冗繁，曾經想改採第三人稱敘述，然而由於此時散文小說尚屬萌芽階段，敘述技巧的實驗未臻純熟，出現這種敘述策略游移、擺盪的情形，實不足為奇：

亦弗令讀吾書者煩瀆。但見書中悉作余字。似余書縷縷



均述己言者。重疊複沓。令人寡歡。今當簡括其詞。  
 仿為史體。取其扼要。並於余有涉者。請諸公觀之（林  
 紓 1914：卷上 31；嗣後譯文加底線表示詞義有待商  
 榷，加框表示林譯增益附麗者。以下皆同）。<sup>10</sup>

作家在故事中離題穿插散文小說該如何書寫之論述，厥為十八世紀文壇一大特色。費爾汀的《約瑟夫·安得魯斯》(Joseph Andrews, 1742)，《湯姆·瓊斯》(Tom Jones, 1749)；理查遜的《佩蜜菴》(Pamela, 1740)與約翰生(Samuel Johnson)的《雷塞拉斯》(Rasselas, 1759)，皆屬此類。林譯中的節刪翻譯把這些文本對話抹除，殊為可惜，使得中國讀者無緣一睹小說發展之軌跡。質言之，此一敘述綜合體可資言者，乃在於作者以中下階層社會的個人之觀點，感知外在經濟、物質條件變化的情形，一改過去貴族與教士階級所專注的遊俠、愛情傳奇與宗教主題。因此形式本身即是本書內涵之一部分。有趣的是，在林紓與王壽昌首度合作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敘述結構相當完整，譯本中所呈現的形式可說是亦步亦趨於原作之思維模式與感情結構。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鋪陳身為敘述者的小說家記錄亞猛(Armand)口述其與馬克(Marguerite Gautier)之間的戀愛史，以及亞猛之父以種種利害關係，動之以情，拆散少年鴛鴦。後面的部分雜以馬克之病中日記，陳述肉體受疾疢折磨之痛楚與對愛人之摯戀（林紓 1981:73-82）。最後一部分則是女友于舒里巴著侍病日誌（林紓 1981:82-84）。從這一簡要之綱目即可得知，該書條目井然，可見林氏並非無小說形式之意識。

譯者再現他者的方式與角度亦可反映出不同文化交鋒的情況。茲以克魯索在荒島的經歷，來說明主人翁對於陌生空間的疑懼，以及他如何「馴化」荒島的空間。人類對於外在世界陌生的

「他者」的凝視，可以是一種觀察、研究的行為，也是一種征服的行為。西方的殖民者往往運用此一思維合理化其侵略行為，因為蠻荒之地，未開化的土著就是野蠻、愚蠢、帶有威脅性，乃屬低級、不文明的，需皆受教化或為被征服的對象 (Boehmer 1995: 72; Marais 1996: 54-56)。因此他者乃成為自我 (Us) 排拒、壓制的對象。克魯索船難後略於島上安頓後，即動身勘查落腳處 ("I travelled for discovery")。他首次登臨小山俯視全島，恐懼與絕望之情溢於言表：

結束而上。巡視四山。覓取棲息之所。匍匐而登。此時始覺一身之委頓。蓋一身已臨孤島。四週皆海。怪石矗立。為浪所激。濺沫作花。遠遠尤有小島。去此可十餘裏。踞餘之西偏。徧顧島中。狀極荒寒不毛。自決此地。必無人煙。或為野獸之窟宅。(林紓 1973:40)。<sup>11</sup>

迨克魯索墾殖荒島後，建茅屋，修築樹籬，播種玉米、小麥，畜養山羊，全面馴服土地，把草萊未闢的荒島轉化成阡陌井然的英國式農莊。空間環境的改變使得克魯索的身分驟然改觀，儼然島主之姿。人類未墮落之前 (prelapsarian) 受命管理萬物，作為大自然的守護者的角色，於此成為猙獰的宰制者、殖民者。同樣地，林譯更是對於克魯索君王式的顧盼自雄特加渲染：

且此全島之中。島主即屬之余。余若興致勃發。稱王稱帝。亦莫不可。又誰為敵國者。又誰加以謠議之言。斤吾善惡者。竟余之力。尤能積穀。高逾邱陵。惟獨坐獨享。需此何益。所耕但求充食。他無所需 (林紓 1973:93)。<sup>12</sup>

四、

林譯優美的辭彙章句，經過近百年來的歷史演變(小說地位與文體的確立、白話文的漸趨成熟、以及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等等)，許多譯作都已有新的譯本，改正以往的誤謬錯簡，使得吾人能夠以更客觀的角度來衡量其地位與價值。<sup>13</sup> 林紓與王壽昌合作翻譯法國作家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95)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啟發林氏二十餘年的翻譯生涯。北京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八一年以《林譯小叢書》為名，重印十種林譯，在〈出版說明〉中特別提到：「他的譯作向以『林譯小說』聞名於世，在翻譯史上自有其地位，在翻譯技巧上，雖為文言，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鑒的地方。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現代漢語譯本，而林譯仍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林紓 1981:1-2)。要之，原作需要不斷有新的譯本出現，因應語言的遞嬗變遷，學術研究的進展，方能精益求精，發掘、開發原作裡未曾被發現的優點 (Benjamin 1969: 72)。職是之故，今日讀者閱讀林譯文學名著，所重者在於其典雅的文字藝術，酣暢淋漓的敘事寫景，而非斤斤計較於餽飭章句，抑或訾議草木蟲魚之名的適當與否。

在散文小說發生的階段中，形式的討論佔有重要的地位。事實上，在職業的書評成為文學品味的評騭與文學生產、傳播的機制之前，書中的序言每成為作家與社會對話的論壇，作家在此一場域中抒發其文學觀與對社會的批評：

從十五世紀以降到蒲瑞佛斯特(Prévost)、費爾汀與理察遜之時代，小說的序言構成批評對話的進行與批評辯論的形成之場域(locus)。書評的時代之後，此道突然(且

持續)衰退,某方面可以解釋為何現代的編者於舊書新刊時,頗為倨傲地刪除作者前言性的材料(Doody 1996: 277)。

值得一提的是,對照狄福每書必有序言的寫作策略,林紓亦不遑多讓。林譯中大量的序跋與此一小說傳統遙相呼應,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作者/譯者皆意識到他們所從事的乃屬更新傳統,開創新局的志業,因此乃以前言作為為言志載道的工具,各抒己見。弔詭的是,林紓在表達個人的家國憂思之餘,在其翻譯實踐上卻刪除原著之序言,而此正是狄福論述「歷史」、「傳奇」、「寓言」、「真相」等與散文小說有關的概念之主要場域。譯介過程中的省略、刪除或改寫使得讀者無法窺其全豹,尤其是該序言與文本的整體結構攸關,或為內文之一部分,鋪陳散文小說體製的演化歷程與特徵,為小說雛形之興起提供理論基礎,是則此種節刪不利於文化的引介與移植,難免有買櫝還珠之憾。

文本的逐譯、越界與轉換牽涉的因素甚夥,舉凡概念產生的起始情況或緣起、跨越的距離、接納或排拒的條件、與移植的概念在新的時空調適與融合。文化社群的生命力與活力經常因為新的理論之引介與流通而得到滋養與維持,不管其形式是部分的借用,或是全盤的挪用、據用,觀念與理論從某一個時空移植到另一個時空,經常使得文化活動獲得源頭活水,醞釀更新的力量,所謂「戶樞不蠹,流水不污」的道理在此。在引介、借用、挪用「他者」的過程中,勢必會選擇、調適、協商、揉和與混雜的議題出現,在協商與辯證的過程中,儘可避免陳腐、習以為常的知識環境所造成的窒礙與侷限(Said 1983: 226-36)。

檢證林譯小說的評價,鄭振鐸氏在林紓棄世一個月零二天所寫的文字裡,聲稱要「更公正的評判他」,因此列出四十幾部堪稱

世界名著的譯作。綜合林譯小說對當代中國文壇的貢獻是：開闊中國人之視野，促進瞭解西洋人之生活習俗、西方文明之強盛，不僅止於船堅砲利，其政治、社會、文化亦有可觀之處；全面提升中國人對於小說文類的重視(1981:2；又參見 15-17)。<sup>15</sup>可是三十七年後阿英在評薦林紓的翻譯成就時，不得不加上個意識形態的尾巴，叮囑讀者「從階級社會關係上……科學的分析性格衝突的時代陰影」(1981:58)。然則從林譯梓行以來，國祚已三易鼎矣，阿英身陷紅朝，須慎言謹行，有其苦衷，也不必深究。在國家機器的操作之下，林譯評價的盛衰起伏所呈現的多樣面貌，不也跟林譯的達譯、越界所產生的三重失真(原作/口譯/筆譯)同樣地撲朔迷離，難以捉摸？

## 註釋

<sup>1</sup>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有識之士乃競相提倡西學，以為救亡圖存之策，先後成立同文館、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等單位從事譯介西方兵學、實業與自然科學等知識。本文所探討的翻譯活動之時期，乃是根據張玉法於〈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一文中所指陳，大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嚴復、林紓等人的主要譯作皆出版於此一時期。至於所譯之書，甲午戰爭之前，大都來自英國；甲午戰後則來自日本者佔大宗(1984:8-9; 尉天驄 1984: 95-97)。至於直譯、意譯的討論，乃屬「文化抗拒的翻譯策略」("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of cultural resistance")之範疇，係針對外來文本融入本國文化脈絡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抗拒、協商、馴化、調整等現象加以分析(Bush 1997: 116)。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黃嘉德所編的《翻譯論集》第一輯

中選錄的林語堂、胡適、曾孟樸、梁實秋、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之文章，彼等對此議題均有詳盡之討論。

<sup>2</sup> 在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之下，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機會更甚於過去務的翻譯者皆呼籲學術、文化界重視翻譯。而且由於智慧財產權的意識逐漸擡頭，翻譯者不滿一直扮演匿名的身分：「翻譯者不應躲藏在作者的燕尾禮服之後，而必須自我肯定地站出來」(Bush 1997: 115)。

<sup>3</sup> 根據馬泰來之考證，林紓之譯作「凡一八四種，單行本一三七種，未刊本二十三種，八種存稿本」(1981:103)，而當中較具有文學價值者大約四十餘種(鄭振鐸 1981:14)。關於林譯小說之原作者、國籍、書名、譯作之標題與出版時地等書目資料，參見馬泰來一系列詳盡之考據文章(1981:60-103;1982:109-23; 1993:114-22)。批評家咸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的內容與體例頗近原作，堪稱佳作。至於其他的譯作，間或由於口譯者文學知識的欠缺或是版本選定的闕失，舛誤之處亦所在多有，這是研究林譯的學者最常提出之質疑。馬泰來在〈林紓翻譯作品原著補考〉一文中指出，陳家麟口譯的《怪董》(Thomas Bulfinch, *The Legends of Charlemagne*)與《俄宮秘史》(William Le Queux, *The Secret Life of the Ex-Tsaritza*)錯誤頗多，「大抵陳家麟對原著性質不甚了了，以致林紓扣槃捫燭，跋語不得要領」、「陳家麟之不學，此又一例」(馬泰來 1993:117；又參閱寒光 1935: 93；左舜生 1966: 112)。有關柏拉圖以純粹之觀念、工匠、畫家(詩人)之隱喻說明模擬論，參閱《理想國》卷十〈來生說〉：「[畫家]在見到[工匠]的作品時，或者不記得，這些祇是與真理有三度隔閡的模仿，雖對真理不具任何知識也能夠容易地寫出來的作品，因為它們祇是表像，並非真實？」(Plato 1985: 289；侯健 1980: 464)。

<sup>4</sup> 《文明小史》第十七回〈老副貢論世發雄談，洋學生著書誇秘本〉中，老貢生姚文通耳聞同鄉董文和在翻譯業昌盛的上海頗享盛名，不禁歎道：「他一向八股是好手，他在家鄉的時候，從沒聽見他讀過外國書，怎麼到了上海，就有了這門大的本事，連外

國書都會改呢？」(1988:116-17)。

- <sup>5</sup> 以寫實主義為小說起源之理論根據，應用在狄福的小說固有其說服力，但難免亦有理論所無法一體涵蓋之侷限性，這是在追尋起源的化約論之過程中易於陷入之盲點與誤謬。狄福的寫實策略中亦摻雜不少的宗教的神寵(providence)與怪力亂神的超自然成分。在寫實的策略之下，這些顯然屬於圓柄方鑿之敘述更進一步證明散文小說參差駁雜的特質，它在遞嬗變遷的過程中，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其他文類的特徵。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Part I, 1678; Part II, 1684)、賽凡提司(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科德》(Don Quixote, 1604)等作品皆具有散文小說之雛形。墨基恩(Michael McKeon)以多起源論重新探討十八世紀小說：「小說係以對立的成分構成辯證式的統一體，在十八世紀的用法裡，『小說』逐漸昇華被默認為技術與認知範疇，堪稱一項成就」(1985:180; 又參閱 McKeon 1987: 26-32; Doody 1996:294-98; Faller 1993: 32-35)。關於小說文類之演進以及敘述模式之形成，參閱巴赫汀(M. M. Bakhtin)的《對話式的想像》(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第一章〈史詩與小說〉。至於讀者群的組成與小說題材的寫作亦有密切之關係。近代女性主義之研究顯示，男女角色的分工實隱藏性別歧視的涵義。這種分工從十八世紀初封建制度徹底解體，手工業式微，代之而起的新興工商社會經濟型態更清楚地界定了公共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女性被賦予家庭內的活動性質，對於公共事務無由參與。這也就是為何十八世紀中葉女性成為散文式小說的主要讀者之後，許多的作家紛紛以家庭(domestic)、閨閣、人際關係等材料為書寫主題。而小說的興起由是與女性閱讀大眾密切掛鉤(Doody 278)。值得注意的是，在林譯中頗受歡迎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1899, 光緒二十五年) (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 與《迦茵小傳》(光緒二十七年, 1901)(Joan Haste, 1895)皆是以女性角色為主, 美麗的愛情故事滿足人們對浪漫情懷的憧憬, 另一方面亦被挪用作為晚清改良運動中爭取婚姻自由, 倡導婦女教育之張本。文本遙譯之成效實未可逆睹(林紓 1961c: 42; 李歐梵 1996: 243; Lee 1965: 165-66)。

<sup>6</sup> 嚴復對於小說的論述主要見於《〈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光緒二十三年, 1897)一文中, 他秉持「物競天擇」的理念, 旁徵博引西洋神話與信史裡頭的各種材料, 從動物、人類之演化馴至於世界列國之競爭, 無所不包, 虛實掩映, 頗有「歷史」與虛構的文本混同合一的況味。要之, 其目的乃是: 「且聞歐美、東瀛, 其開化之時, 往往得小說之助, 是以不憚辛勤, 廣為採輯, 附紙分送, 或譯諸大瀛之外, 或扶其孤本之徵」(1960: 12)。至於梁啟超竭力鼓吹小說文類之理論及其社會功能, 概見於氏著《論譯書》(光緒二十二年, 1896)、《大同譯書局序例》(光緒二十三年, 1897)、《譯印政治小說序》(光緒二十四年, 1898)、《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光緒二十八年, 1902)、《告小說家》(民國四年, 1915)等文。

<sup>7</sup> 縱使梁啟超的新小說理論替當時的翻譯小說提供合理化的基礎, 在傳統儒家的道統裡, 外邦異域的事物並不合乎「道」, 為了使其被接受, 文體風格乃成為賦予作品具有某些真正的道德價值之因素: 「對林紓, 如同對嚴復與吳汝綸而言, 使用古文是一種十分刻意的選擇, 它在文學傳統裡的顯著地位, 使其有力量說服士人階層接納非中國之觀念。與古文發揮的修辭功能同時俱來的是, 說服的預定目的與達成之手段之間的吊詭: 移向外來的他者與反向移動儘可能緊貼熟悉的自我。林紓企圖護衛古文之際, 此一吊詭戲劇性地展現出來」(Hu 1995: 79)。

<sup>8</sup> 根據王德威教授之研究, 關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在時間的起點上並非以五四運動為嚆矢, 而是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的士人的啟蒙運動, 不管在文學作品的創作抑或翻譯作品中, 除了傳統



說部之外，狹邪、公案俠義、譴責與科幻文類的流行，在在證明在現代性的追求不可化約為線性的進化論：「[這些作品]又何嘗不有意無意洩漏對欲望尺度以外的欲望，對正義實踐的辯證，對價值流動的注目，對真理/知識的疑惑？」(1998:38; 又參見 29-32)。李歐梵在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指出，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鴻溝的擴大與斷裂、以及具有強烈的個人主觀性的社會批判意識瀰漫晚清民初的知識界，國族論述、抵抗帝國主義侵略與文化運動交互轆轤穿插，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現代性的構成因素實為雜駁不一的綜合體(李歐梵 1996:229- 30)。

<sup>9</sup> 翻譯的信實度取決於譯文的形式與內容是否與原文契合，節刪竄改或增添附麗皆非正法：「翻譯必須儘其可能遏止想要傳達某事，逐譯意義」(Benjamin 1969: 78)。顯然譯者應該避免將主觀的意識投射於譯文中。這裡牽涉到一項有趣的問題，譯者是否有權更改原文的錯誤，還原歷史的真相？劉禾(Lydia H. Liu)以克魯索燒製陶器為例，說明殖民者如何挪用他人的技術，進而據為己有，她稱之為「殖民式的否認詩學」(Liu 1999: 745)。由於磁器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屬於奢侈品，英國尚無製作之技術，狄福反對進口，因而克魯索燒製的器皿一律稱之為「瓦器」(“earthen pots”) (Defoe 1985: 133)。而林紓在翻譯中卻依粗窳、精細程度，一一分辨為「瓦器」、「陶」與「瓷器」(林紓 1973: 87)。關於英國陶瓷技術之發展，從最初的進口國轉而成為出口國，請參閱劉禾之文章〈魯濱孫·克魯所之瓦罐〉(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特別是最後一節詳盡之縷述(Liu 1999:749-57)。

<sup>10</sup> “I shall no longer trouble the story with a relation in the first person, which will put me to the expense of the thousand Said I's, and Said he's, and He told me's, and I told him's, and the like; but I shall collect the facts historically as near as I can gather them out of my memory from what they related to me, and from what I met with in my conversing with them,

and with the place”(Defoe 1840: 40; 嗣後原文加底線表示該字之譯文有誤，加框表示漏譯。以下皆同)。

- <sup>11</sup> “[A]nd thus armed I travelled for discovery up to that hill, where after I had with great labour and difficulty got to the top, I saw my fate to my great affliction, viz. That I was in an island environed every way with the sea, no land to be seen, except some rocks which lay a great way off, and two small islands less than this, which lay about three leagues to the west.

I found also that the island I was in was in was barren, and, as I saw good reason to believe, un-inhabited, except by wild beasts...”(Defoe 1985: 71)。

- <sup>12</sup> “I was lord of the whole manor; of if I pleased, I might call my self king of emperor over the whole country which I had possession of. There were no rivals; I had no competitor, none to dispute sovereignty or command with me. I might have raised ship loadings of corn; but I had no use for it; so I let as little grow as I thought enough for my occasion”(Defoe 1985: 139).

- <sup>13</sup> 今所見之《魯濱孫飄流記》譯本以林紓、曾宗鞏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所翻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者最早。此外尚有諸多譯本，或為新譯，或為舊譯新刊，皆顯示該書在西洋文學中譯的接納過程中甚受歡迎，流傳頗廣。例如張葆庠(上海啟明書局，1949)、胡鳴天(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55)、臺北啟明書局以編輯室名義出版之譯本(1956)、紀德鈞(台南綜合出版社，1974)、齊霞飛(臺北志文出版社，1984)、佚名(桂冠出版社，1993)、黃杲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郭建中(臺北林鬱出版社，1998)、邱麗素(臺北西代書版社，1999)。黃

譯尚包括該書的第二部《魯濱孫飄流續記》，是除了林譯之外唯一的全譯本。如果就仲介文本的完整性及其對於文化交流的影響此一觀點而言，就令人不得不佩服林譯的洞見與勉力為之的堅忍和毅力。至於魯濱遜故事所隱涵的清教式資本主義傳統，冒險故事所衍生的殖民擴張、帝國大業等主題，已在西洋文學傳統裡形成一獨特的文學類型「魯濱遜故事」(Robinsonades)。以此為題材的諧擬，不管是續作或改寫，歷來為數甚夥。較為人所熟知的有 Johann Heinrich Campe, *Robinson der Juengere* (1779); Johann David Wyss, *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1812); R. M. Ballantyne, *The Coral Island* (1858); Jules Verne, *L'Il Mystérieus* (1874); Muriel Spark, *Robinson* (1958); Michel Tourrier, *Friday* (1967); J. M. Coetzee, *Foe* (1986)。身為南非作家的科特吉(Coetzee)親身經歷黑人遭受種族歧視之煉獄，更是以後殖民主義之觀點，翻轉克魯索/星期五之間的主奴關係，替弱勢者發聲，企圖扶正被扭曲的種族/人權的正義 (Green 1990: 6-12; Bristow 1991: 94-99)。

<sup>14</sup> 林紓逝世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鄭振鐸的紀念文字寫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原載於鄭著《中國文學研究》下冊，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 Works Cited

- 王德威。199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 左舜生。1966。〈西洋文學翻譯者林紓〉(1953)。頁 111-23。《文藝史話及批評》。第一冊。臺北：文星書店。
- 朱義胄。1961。《春覺齋著述記》卷三。頁 1-66。《林琴南先生學行譜記四種》(1949)。台北：世界書局。
- 李伯元。1988。《文明小史》(1906)。臺北：三民書局。
- 李歐梵。1996。〈追求現代性(一八九五——一九二七)〉。(1970年代)。頁 229-99。《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公司。
- 阿英(錢杏村)。1960。〈序例〉。頁 1-2。《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 。1966。《晚清小說史》。香港：太平書局。
- 。1981。〈關於《巴黎茶花女遺事》〉(1961)。頁 53-59。《林紓的翻譯》。
- 阿英編。1960。《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
- 林紓。1961a。〈《黑奴籲天錄》跋〉(1901)。頁 24。《林紓》。《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 。1961b。〈《迦茵小傳》序〉(光緒三十一年；1905)。頁 40-41。《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 。1961c。〈《紅礁畫槳錄》序〉(光緒三十二年；1906)。頁 42-43。

《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1961d。〈《旅行述異》〉(光緒三十二年；1906)。頁 52-53。《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1961e。〈《孝女耐兒傳》序〉(光緒三十三年，1907)。頁 5-6。《春覺齋著述記》卷三。

林紓、曾宗鞏譯。1973。《魯濱孫飄流記》(1905)。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14。《魯濱孫飄流續記》(1906)。上海：商務印書館。

林紓、王壽昌譯。1981。《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北京：商務印書館。

林薇。1997。〈選編後記〉。頁 371-76。《畏廬小品》。林薇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

胡適。1986a。〈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3)。頁 65-152。《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二卷。(胡適作品集 8)。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6b。〈論翻譯——與曾孟樸先生書〉(1928)。《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七、八、九卷。(胡適作品集 14)。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侯健譯。1985。《柏拉圖理想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夏志清。1977。〈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頁 63-100。《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馬泰來。1981。〈林紓翻譯作品全目〉。頁 60-103。《林紓的翻譯》。

---。1982。〈林譯提要二十二則〉。頁 109-23。《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Chan Ping-leung 編。香港：香港大學。

---。1993。〈林紓翻譯作品原著補考〉。《清末小說》。16：114-22。

張玉法。1984。〈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頁

1-30。《漢學論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1984。《漢學論文集》。第三集，晚清小說專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尉天驄。1984。〈晚清社會與晚清小說〉。頁 95-110。《漢學論文集》。

梁啟超。1989。《飲冰室合集》十二冊。林志鈞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9a。〈譯印政治小說序〉(光緒二十四年，1898)。《飲冰室文集》之三。頁 34-35。收於《飲冰室合集》。

---。1989b。〈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光緒二十八年，1902)。頁 6-10。《飲冰室文集》之十。收於《飲冰室合集》。

復旦大學中文系 1956 級《中國近代文學史》編寫組。1960。〈近代翻譯小說及林紓〉。頁 241-53。《林紓研究資料》。

寒光。1935。《林琴南》。上海：中華書局。

馮奇編。1998。《林紓》。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黃嘉德編。1991。《翻譯論集》(1940)。《民國叢書第三編·語言·文字 50》。上海：上海書店。

單德興譯。1995。《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公司。

曾錦漳。〈林譯的原本〉(1966-67)。頁 324-45。《林紓研究資料》。

曾憲輝。1990。〈左海畸人林畏廬(代前言)〉。《林紓詩文選》。曾憲輝選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楚卿。1960。〈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光緒二十九年，1903)。頁 27-31。《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劉人鵬。1998。〈「中國的」女權、翻譯的慾望與馬君武女權說譯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8):1-42。

- 魯迅。1973。〈『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頁 203-26。《二心集》。收於《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鄭振鐸。1981。〈林琴南先生〉(1924)。頁 1-17。《林紓的翻譯》。
- 錢鍾書。1990。〈林紓的翻譯〉(1963)。頁 83-122。《七綴集》。(錢鍾書作品集 7)。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錢鍾書等。1981。《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薛卓。1983。〈林紓前期譯書思想管窺——讀『林譯小說』序跋劄記〉(1981)。頁 387-99。《林紓研究資料》。
- 薛綏之、張俊才編。1983。《林紓研究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彙編乙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嚴復。1960。〈《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光緒二十三年，1897)。頁 1-12。《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 嚴幾道。1991。〈譯天演論例言〉(光緒二十四年，1898)。頁 3-5。《翻譯論集》。

Asad, Talal. 1993.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71-99.

Bakhtin, M.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and London: U of Texas P.

Benjamin, Walter. 1969.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 (1923).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

Schocken. 69-82.

Boehmer, Elleke. 1995.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 Oxford: Oxford UP.

Bristow, Joseph. 1991. *Empire Boys: Adventures in a Man's World*.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Bush, Peter. 1997. "The Translator as Arbiter." *The Translator's Dialogue: Giovanni Pontiero*. Eds. Pilar Orero and Juan C. Sager.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15-26.

Defoe, Daniel. 1985.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Ed. Angus Ro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840.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Vol. II (1719). (Also known as *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Ed. Sir Walter Scott. Vol 2 of *The Novels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Thomas Tegg, 1840.

Doody, Margaret Ann. 1996. *The True Story of the Nove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Faller, Lincoln B. 1993. *Crime & Defoe: A New Kind of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P.

Goldmann, Lucien. 1974. "Genetic Structur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Velocities of Change*. Trans. Catherine and Richard Macksey. Ed. Richard Mackse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89-102.

Green, Martin. 1990. *The Robinson Story*. University Park and



---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P.

- Hu, Ying. 1995. "Translator Transfigured: Lin Shu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Position* 3.1: 69-96.
- Lee, Leo Ou-fan. 1965. "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 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 *Papers on China* 19: 159-93.
- Liu, Lydia H. 1999. "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 *Critical Inquiry* 25.4: 728-57.
- Marais, Mike. 1996. "Colonialism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English in Africa* 23.1: 47-66.
- McKeon, Michael. 1985. "Gener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Novel." *Cultural Critique* 1: 159-81.
- .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 Miller, J. Hillis. 1993. *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Neubert, Albrecht. 1989. "Translation as Mediation." *Babel: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Between Nations*. Eds. Rainer Kömel and Jerry Payne. Glasgow: Aberdeen UP. 5-12.
- Novak, E. Maximillian. 1964. "Defoe's Theory of Fiction." *Studies in Philology* 61: 650-68.

- . 1983. *Realism, Myth, and History in Defoe's Fiction*. Lincoln and London: U of Nebraska P.
- . 1996. "Defoe as an Innovator of Fictional For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Ed. John Ri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41-71.
- Orero, Pilar and Juan C. Sager, eds. 1997. *The Translator's Dialogue: Giovanni Pontiero*.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lato. 1985. *The Republic*. Trans. Richard W. Sterling and William C. Scott. New York: Norton.
- Sabine, Mark. 1997. "Giovanni Pontiero's Translation of Clarice Lispector's *Laços de Família*." *The Translator's Dialogue: Giovanni Pontiero*. 145-54.
- Said, Edward W. 1983.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226-47.
- Spivak, Gayatri. 1993.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79-200.
- Watt, Ian. 1957.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s.